一五一十周刊

NO.120
2013年8月23日

彼得·海斯勒：埃及越界 | 林达：一个首相的故事

陈季冰："旧邦维新"之难——十字路口的埃及（下篇）

撕裂的埃及



编者的话

近来，回到广场上的埃及人正经历了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幕，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埃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裂，走过无法返回的过去，面向不可预知的未来。为什么冲突不断升级，各方势力如何角力？谁在践踏民主，谁在捍卫自由？本期周刊承接 114 期周刊，继续关注埃及。

前总统穆尔西遭罢黜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支持者持续示威。而对穆尔西的反对者来说，这样的声音，就像小孩子被拿走玩具后的哭闹，并不值得在乎，反而应该尽快让他闭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武力清场，来结束“无政府状态的蔓延”。但无论埃及当局是否如军方所辩称的别无选择，顺应民意，这样的暴力行动都应该受到谴责。如彼得·海斯勒所言：“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来自英国《卫报》的文章，分析了穆斯林兄弟会。軍方是经济、政治力量雄厚，却长期统而不治的实权掌握者。而穆兄弟是强调非暴力却追求用强权捍卫宗教的顽强反对派。

民主不仅需要投票选举的程序正义维系，更需要对异己的尊重，无论这种声音来自多数还是少数。陈季冰回顾了两次革命中间，军方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表现，点出了冲突的根源：“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坦克飞机和真主的旨意，哪个对民主威胁更大。如果各方未来没有在法制框架下的合作，互相容忍，军队没有完成现代转型，穆斯林兄弟仍是宗教性质的半地下组织，局势只会更加恶劣。

谢里·伯曼以“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论证“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埃及未来必须容忍穆斯林

兄弟会的存在，而不是将其妖魔化成狂热分子， 并试图消灭他们。如果欧洲的各种派别可以实现联合，中东应该借鉴这一点。

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一些国家经历了腥风血雨，一些国家则平稳前进。有军人干政传统的国家，民主化过程尤其波折。埃及能否和平过渡，实现政治稳定，也许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推测可能的模式。是由自上而下由政治强人开启改革，还是靠民众坚持，或是制度设计、系统协商的成果。在西班牙，非军人出身的苏亚雷兹成功领导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政党合法化、起草新宪法，被誉为“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伊拉克，萨达姆时代结束后，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在茶馆论政坚持政治参与，靠自己的努力推动民主；在缅甸，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国家转型，“协议转型”的各方相互妥协，减少分歧，避免冲突，是保证改革平稳、顺利推进的关键。

没有人知道埃及将往何处去，但正如所有向往民主的人一样，为了更好的生活，消除仇恨寻求共识，是埃及必须迈出的一步。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事】

9-1 彼得·海斯勒：埃及越界（译言）



彼得·海斯勒，美国作家，著作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曲。

“在埃及，当下的冲突反映出在几十年独裁统治后，各种团体对于初生民主各自不同的反应。对于兄弟会，这意味着倔强地跟随它所相信的正确而合法的政治路径，即使这疏远了其他人且导致灾难；在军队方面，这则关乎执行多数派最糟糕本能的问题。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为何是现在？遥望埃及，这是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疑问。将近一个半月以来，甚至在军队罢黜总统穆尔西后，当局仍允许他的支持者在开罗两处进行长期而和平的静坐。但就在之前周三早晨，警察突然袭击了这两处地方，拆毁了帐篷并动用武力驱赶示威者，而暴力在这个国家一触而发。据报道近三百人被杀害，大部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这些死者中有 17 岁的 Asmaa al-Beltagy，她是兄弟会领导者之一 Mohamed al-Beltagy 的女儿。而主管外事的埃及副总统巴拉迪已辞职以示抗议。2005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拉迪一度是政府国际合法性的关键。几个星期来，他和外国外交官尝试过说服军队和平地处理示威活动，等他们出来让这些反对者自行离去——对任何外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个靠谱的策略。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埃及，多少人期待着这场暴乱。上个月在开罗，我与一位外国外交官朋友见面，她告诉我她从安保人员那里听到他们将让这场静坐持续大概一个月，但将在八月底之前动用武力驱赶。“现在是斋月，没太多事，而交通堵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这名外交官表示。她所指的是兄弟会组织每日游行以封锁开罗交通的策略。她说军队将在斋月之后失去耐心，会希望在九月新学期开始前城市能恢复正常，而斋月在上周结束。而当我跟警察谈话时，他们看起来接受甚至欢迎暴力的必要性。兄弟会和安全部队之间有着一段长期的仇恨历史，而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官员们示反对抗议为一种恩惠而不是一种权利。上个月，我问一名在上埃及的官员是如何看待兄弟会在开罗的



示威。“如果你从一个小孩那里拿走一个玩具，难道他不会哭闹一阵子吗?”这名官员说，“那就让他们闹一会儿吧。”

但一直可以预见的是军队最终将进行制止。当我周二电话一位在开罗的好友，形势仍比较平稳，但他强调军队将在接下来两天内行动。他并没有内部消息——只是感受到街上的气氛。“军队感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他说，“开罗的人希望军队有所作为。他们说军队如果不能搞定静坐者那未免也太弱了。”今晨，在死亡人数达到上百后，过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再次电话我朋友。“现在我们处于紧急状态，警察和军队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他说。他认为大部分埃及人将支持这次行动，而谴责兄弟会反抗安全部队。“兄弟会正失去他们一度拥有的大众支持，”他称，“没人对他们感到满意。对他们的同情已消散殆尽。这就像狗在巷子里奄奄一息。没人关心。”

埃及阿拉伯春天的悲剧之一在于许多错误建立在民主该是怎样的错误理解上。在过去兄弟会当权的一年半中，它的领导者们过分强调“投票箱”，以为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胜利给予了他们权力以自己的意愿去统治。事实上，兄弟会获得的支持并非那么深——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2012 年 5 月，穆尔西获得的普选票还不到 25%。但穆尔西和其他兄弟会的人都表现得好像自己得到人民授权。他们对于民主中更微妙和实操性的元素并不理解，他们未能作出妥协或者联合其他团体。他们的治理方法看起来抽象且理论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以草根组织出名的队伍，兄弟会却不了解埃及事实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特点在穆尔西下台后愈发严重。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兄弟会的主要策略是诉诸外国媒体和外交使团。在某种程度上，它起了一定作用——兄弟会明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鉴于其选举而出的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解散，而它的领导者被囚禁。但它也严重脱离埃及社会主流，其堵塞开罗交通的策略也使其在首都树立了更多敌人。

与此同时，军队则将相反的方法推向极端。它采用了民粹主义的策略，用直升飞机巡逻和挥动国旗以吸引普通的埃及人，而这些符号对经过几十年军事统治的人们很受用。从一开始，国防部长塞西就将军队描绘为执行人民意志。在初期阶段，这是真的——毫无疑问大部分埃及人希望穆尔西下台，正如大部分人觉得静坐和游行是一种干扰。但是，在军队给予人民他们所要的过程中，却糟蹋了核心民主价值：合法程序的重要性，和保护少数派声音的需要。

对决中的双方通常被从宗教角度进行阐释：支持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者，站在军队一方的非宗教主义者。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中宗教确实有其支配方式，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还有其他作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埃及，当下的冲突反映出在几十年独裁统治后，各种团体对于初生民主各自不同的反应。对于兄弟会，这意味着倔强地跟随它所相信的正确而合法的政治路径，即使这疏远了其他人且导致灾难；在军队方面，这则关乎执行多数派最糟糕

本能的问题。在任何一方，你都可以认出民主本性的种子，但它却以扭曲的方式成长，只因政治和社会环境已被过去半个世纪的体制所破坏。

对于普通埃及民众来说，过去两年给他们带来的教训并不是那么容易忘却。在上个月政变后，我前往上埃及，因为我很好奇首都以外的人们怎么理解这些事件。上埃及是这个国家 40% 的人口的所在地，在革命后的选举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兄弟会在这个地区获得多数人的选票。但上个月我所交流的大部分人对兄弟会的感情已不再。“我对他们感到很同情，”在 El-Balyana 的镇上，一个男人告诉我，“在他们罢黜穆尔西后我对他很同情。而无论下一个是谁，我已准备同情他。”

“我们就像足球迷，”在一个叫 El-Araba 的村里，一位叫 Mohamed Latif 的工程师告诉我，“当有人进球，我们欢呼。但这无关紧要。你真的认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有作用吗？为什么你想跟我们说话？我投给了穆尔西，我为他祈祷，但他失败了。我反对现在所发生的。我们应该将他作为名誉人物保留。我们可以将权力交给军队和其他人，但留下穆尔西作为名义上的总统。”

我问他是否觉得政变是个错误。“不，”他说，“他失败了。我不会再投给他们了。我不想要民主。”他继续道，“中国有民主吗？它的经济表现如何？我不关心民主和自由。”

（翻译：黄缎子）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2 侯承谦：谁领导血腥镇压后的埃及

侯承谦，国际关系月刊编辑

> “
> **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 25 号，军方就曾经发过 48 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 8 月 7 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 ”

8 月 14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安全部队开始对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集会展开清场行动，出动推土机铲走两处营地的帐篷及施放催泪弹，更出动机关枪向人群开火。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宣称，分处城市两端的两个营地中，2200 多名抗议者被杀，10000 多人受伤，而临时政府说，全国范围内只有 500 多名平民被打死，还有 43 名警察。警方拘捕至少 200 名穆尔西的支持者。临时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埃及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无可避免的杀戮

是次清场行动并非偶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表示，事发前已有先兆：“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 25 号，军方就曾经发过 48 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 8 月 7 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埃及总理贝卜拉维（Hazem Al Beblawi）辩护称当局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来结束“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利克则支持这个说法，认为在国际斡旋失败后，除了武力清场之外，临时政府已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结束目前的对峙局面。

镇压过后强硬派占尽上风

今次镇压后，虽然未必会出现大规模内战，但摆在埃及面前的是长期不稳定和动荡。埃及的中东政治学者塔里克判断，流血冲突是暂时的，整体局势应该还在埃及军队控制之内。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安惠侯亦表示同意，认为穆兄会本身没有军队，况且多方势力都不会支持埃及出现内战，但双方还是难免继续僵持。



当临时政府和反对派撕裂后，埃及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有公信力，并有能力领导埃及的政府。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索玛斯·米尔尼（Seumas Milne）评论，中东人民对独立和社会公义的追求会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此刻唯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民主领导人，才能带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走出困局。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Adly Mansour）曾是埃及首席大法官，亦曾担任政府多个部门的法律顾问，熟悉政府运作。据埃及当地媒体报导，“曼苏尔生性冷静，行事十分低调，极少在媒体面前露脸”，于国内拥有人际网络。但于是次对反对者的打压却大失民心，于国际上更恶名昭彰。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临时副总统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虽比曼苏尔少一些于该国政府工作的经验，但曾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及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他，却更熟习国际治理模式。他原本有望担任过渡政府总理，但由于国内支持度却不高，被最大的保守政党反对，所以只被委任为临时副总统。在这血腥的清场行动时，他已经辞去副总统一职。开罗美国大学的贾法教授（Adel Abdel Ghafar）指出：“巴拉迪辞去副总统，代表政府内部有两种矛盾的方针，亦象征强硬派盖过中庸的声音，令人更加怀疑埃及能否建立民主和包容的政府。”

民主元素要结合埃及特点

筹组政府之余，亦要惦量适合埃及的民主模式。“阿拉伯之春”之后，民主治理只能向前走。“他们没有退路，不可能退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指出。布鲁金斯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阿舒尔（Omar Ashour）认为，对于埃及而言，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以确保基本自由和民主机制为前提，它们是埃及革命的唯一果实。

与埃及目前政治风格相似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模式先定立一套严谨的非伊斯兰化的法律，以军队捍卫世俗主义，在军方支持下演进民主化。这套方法尽管专制，但土耳其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的发展典范。然而，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下台和今次临时政府动用武力，都令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海亚教授担心，许多中东国家必须反思，类似土耳其那样的亲伊斯兰政权，是否能够在本国长期维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国富主任同样忧心：“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我没看到哪个阿拉伯国家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民主模式，埃及也没有可以完全借鉴的物件。我认为，只有将民主的基本要素与埃及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好的途径。但这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很难。”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心脏，中东秩序的重建离不开埃及的参与和支持。中东能否恢复秩序，就在于埃及当权者能否不把宗教与管治混为一谈，走上民主路。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析】

Patrick Kingsley，英国卫报驻埃及记者。

9-3 卫报：穆斯林兄弟会是何许人也（译言）

> **阿拉伯之春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以机遇，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现在他们自己反倒成为了暴力抗议的目标。我们一起来检视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势的。**



2012 选举中的穆尔西支持者

25 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锁在清真寺里 5 小时了，但是抗议者却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他们。有的人简单地想用这些人交换被穆斯林兄弟会抓捕、殴打的抗议者。“我们的宗教是宽容的”，一名抗议者透过窗户向里面的兄弟会成员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可是其他抗议者不同意。“他们是异教徒”，一名男子大叫。“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吧。”

这件事发生在 3 月 22 日星期五，当时的开罗笼罩在一片白灰雾霾中，这是喀热新风的杰作——携沙带土的大风每年春天从撒哈拉沙漠吹来，把街道和天空染成模糊单一的黄褐色沙尘堆。但是高出地面的莫卡坦区——这里是城东贫民区岩石隆起的小山，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所在地——的空气中，却更加弥漫了一股肃杀的气氛。



兄弟会大本营周边的街区里，有不少燃烧弹、石头、鸟弹和催泪弹。其他地方，黑烟滚滚向天冲去，抗议者烧毁穆罕默德·穆尔西——埃及总统、兄弟会坚定成员——的画像。抗议一开始只是为了反对穆尔西及其声称的顺从兄弟会的利益，而目前已演变成为全方位街头混战，交战双方是兄弟会死忠和反对的游行者。

星期五混战的发生地点和原因一样值得关注。自从 2011 年埃及人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以后，抗议者通常关注的是国家体制，而兄弟会官方则声称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更广泛的暴力。但是上个月，抗议者只选了兄弟会总部为目标。个中意味十分明显。对于反对者来说，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已是革命目标的政治、军事敌人，成了和穆巴拉克相同的人。“穆尔西就是穆巴拉克”，从开罗以西 10 英里小镇赶来参加抗议的马哈·哈塔布说。“两场革命完全相同。”

反对伊赫瓦尼——阿拉伯知名组织——的案情记录长之又长。然而如果它可以因为某个评判而烟消云散，这评判就该是如此：民主不会终结于投票箱——也不会终结于兄弟会及其分会的所作所为中。

反对者当下尤其愤怒的是穆尔西看似独裁的行动——他 11 月时为自己加官进爵，强迫他人接受高度争议的新宪法。草案由兄弟会支持者掌控的委员会起草。言论自由、女权、少数族裔正当权利描绘得模糊不清，而且草案意在建立伊斯兰国家。



埃及亚历山德拉自由与正义党党部前有人抗议

在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急需建立政治共识之秋，穆尔西还被批评任人唯亲，指派盟友领导埃及行政机构。美利坚大学开罗分校首席历史研究员卡勒德·法赫米解释道：“大家普遍担忧的是，埃及可能会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更为细化的担忧包括政治——无情的穆尔西让人感觉不到他想改革——以及爆发严重厌女症。上月，兄弟会一分声明说，如果女性未征得丈夫许可便参加工作，就会导致“社会完全崩解”。兄弟会支持者希望把埃及建立成类似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但是这样的声明强化了如下观点：尽管当前两性平等不会比穆巴拉克时期差，兄弟会的做法却是想把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

可是兄弟会对这些指控充耳不闻。在他们眼中，这是一场长期痛苦的运动，他们拥有民意支持，还有社会工作的丰富历史基础，试图整合经济环境，团结全国。正当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提高之时，面向政府和兄弟会的愤怒可能产生于埃及社会上上下下。然而兄弟会始终认为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特别是它所属的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了 2011 年以来的所有选举。而且兄弟会觉得，批评者都是并未真正理解普通埃及民众感情的都市精英。

兄弟会发言人吉哈德·哈达德今年早些时候对《卫报》说：“这么多民众相信同一件事，支持同一个人，让那些批评家感到恐惧。”“其实”，他补充道，“穆斯林兄弟会也许中东是最成熟、非暴力的政治运动。”

回到 2011 年早期，有些人可能会惊讶于兄弟会当今的地位。中东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下，从远望之，取代他们的，会是一代年轻的西化网民，深刻理解自由主义，熟练把玩爱疯。兄弟会成员在自由广场起到很大作用——但当时，甚至连穆尔西都说，兄弟会无意争权夺利。“我们不想领导革命”，他说，“但我们想成为革命一部分。”兄弟会甚至除名了一个想参与总统选举的人。相反，自由派领袖如巴拉迪——前联合国外交官，则受到吹捧成新一代埃及领导。

可是巴拉迪没有参选。两年来，阿拉伯之春最显著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的权力真空终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化身取代。在突尼斯，2011 年起义的源头，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革命之前还流亡海外，它被视为突尼斯版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兄弟会政治派别控制力 2012 年短暂存在的议会，曾经是高级官员的穆尔西，去年 6 月得到民众选举为总统（之前他推出运动，以示独立）。在利比亚，学到了政治分支并未在去年的选举中收到理想结果——但仍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同时，兄弟会叙利亚分支在内战中角色凸显（也有人认为其难以驾驭）。“兄弟会”，记录革命过程埃里森·帕吉特总结道，“一夜之间就从半隐密反对者变成了合法政治强权。”

真是惊人的转变。兄弟会成立至今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积累基层社会工作的管理经验：开诊所，服务社会地位低的人，在埃及最贫穷地区发放食物。这些工作让他们受到埃及人的广泛欢迎——也使其有能力在穆巴拉克倒台后迅速动员。“他们组织有效”，《阿



拉伯简史》作者约翰·麦克雨果说。“他们在全埃及都有选举组织，而其他人做不到这点。”

兄弟会还发展到国外——叙利亚、约旦、科威特和利比亚都有他们的分支。兄弟会成员在加沙建立哈马斯，突尼斯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是有兄弟会支持者创建。“大家都觉得复兴运动党的思想和兄弟会的思想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有力传人或盟友”，政治伊斯兰专家、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主任沙迪·哈米德解释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所有伊斯兰运动的源头。”



穆斯林兄弟会实际掌门沙特尔

兄弟会历史不短。到上周六已有 85 年。其实，兄弟会建立于 1928 年 3 月的埃及——创建者是教师哈桑·巴纳。他厌倦殖民主义和埃及西化的生活，巴纳认为有必要建立组织，推行传统伊斯兰价值。20 年后，据估计兄弟会成员发展到 5 万人。到了今天，他们声称这一数字已到达 100 多万——大部分普通成员都是中下阶层，但是领导人则多为医生或商人。他们每人都捐出一部分收入，为兄弟会的运动提供金援。

成员从 20 名左右元老组成的指导办公室获得命令——指导办公室通常由最高领袖穆尔西的·穆罕默德·巴迪领头，但是由他的副手之一，商人海拉特·沙特掌权。“穆尔西的不指挥行动”，一名中层兄弟会成员说。“我们若想组织游行，海拉特·沙特就会具体负责……他的个性很强。他知道如何让众人跟随他。”

巴纳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同僚都说他乐于从穿西装改回穿阿拉伯长袍，再次取得他五花八门听众的支持。他讲求实用，又多才多艺，这几乎构成悖论——如此特质也能用来形

容他形形色色的继任者，包括从渐进主义者哈桑•侯德比到原教旨主义者赛义德•库特布。

但是兄弟会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国际力量。虽然 80 年代的尝试使其各派别紧密结合，可是兄弟会的国际委员会“无法真正有效控制各地分支”，哈米德说。“没错，他们的确会共同商讨事务，打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世人看不出兄弟会有能力监督一些大型区域活动。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紧随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兄弟会的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分支曾经不再听命于上级——尽管他们和上级的关系比其他同盟都来得密切。

“他们的关系温暖又友好，许多人都一同流亡——比如流亡到伦敦”，哈米德说。“所以你会在聚会中看到他们拥抱，他们相见甚欢，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在过去数十年选择了稍微不同的发展方向。”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就是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拉希德•甘努奇曾在开罗上学——他在那里受到埃及兄弟会激励——直到 1970 年代返回突尼斯。然而，甘努奇的女儿、复兴运动党发言人于斯拉说：“两场运动并不相同。他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本质不一样。”

比如：无论是信念还是实用，拉希德•甘努奇和复兴运动党部分成员似乎更青睐多元社会，而不是埃及那样。去年 3 月，甘努奇发表了演说，认为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不冲突。“宗教的基本范围不应涉及国家组织”，他说，“而更应该是个人、私人的信仰。”

虽然复兴运动党和埃及兄弟会可能都有相同的广泛目标，但是他们运作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各自行动也就不一样。从 90 年代早期起，复兴运动党遭到突尼斯独裁者的强烈打压，也就是说，革命发生时，他们的组织结构相当脆弱。运动党不少高级人物流亡多年，“其实他们回到了自己不再了解的社会”，哈米德说。

2011 年后，复兴运动党几乎要白手起家。尤其是他们要在看似比埃及世俗得多的政治环境中成长。“突尼斯总有土著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政党”，于斯拉•甘努奇说，“我觉得差异总会存在。”

相反，埃及兄弟会用了 40 年时间扎根，2011 年起义发生的社会，早已受到强烈的基层伊斯兰热潮影响。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是非法组织，但从 70 年代开始，埃及当局默认他们发展自己的社区组织。到 2005 年，兄弟会成员已经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有时看起来就像当前的行动一样无望，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教会他们相当多的组织技能，远胜过新出现的世俗对手。



兄弟会去年 11 月快速制定新宪法，就是这种成熟特质的例子。用他们的话说，埃及急需新宪法确保埃及民主转型。虽然穆尔西并未动用他的权力来推行新宪法，但是争议还是出现了，宪法面临忠于旧政权检察官的拖延——拖延埃及后 2011 时期的状态。纵然这场运动短期内看似独裁，长期来说，新宪法确实限制了穆尔西的权力——兄弟会自认为好意为之，如果他们没有弄巧成拙的话。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来到莫卡坦抗议的人，或上月数百个于此再现哈林舞的人，或数千个于赛义德港准备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人来说，如此说法十分可笑。批评家认为，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使他们过度防卫、神经兮兮，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无法驾驭民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自兄弟会肇建始，许多领袖——包括穆尔西——都曾进过监狱，有的还遭处决。好几十年来，他们都是非法组织。为了生存，兄弟会的运动仰赖于隐蔽，以及严格的等级。“兄弟会长期以来都不是透明或民主的组织”，麦克雨果说。“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一名开罗兄弟会成员补充道，“然后你就能够晋升”，穆尔西就是最好的例子。

穆尔西本可以绝对多数赢得选举，批评家承认。但是他们感到，穆尔西获得的支持都是不甘不愿的。去年 6 月，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信政治伊斯兰而投票给穆尔西，而是穆尔西比对手阿默德·沙菲克——最终选举的对手，也是穆巴拉克时代过来的人——好出一点点。其实，去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55.7%的选民投给了非伊斯兰主义候选人。

穆尔西甫为总统时，他似乎认同选民的意愿，承诺“将以全埃及人的名义”执政。可是批评家说，他和同僚心中只想着兄弟会的利益。他们引用宪法危机，即所谓的伊赫瓦尼主义，还声称，自由与正义党政治家起草的选举法草案，允许自由与正义党为近在眼前的议会选举重划选区。

兄弟会否认这项指控。“我们确实赢得了上次的议会选举，但是总理不是我们党的”，自由与正义党发言人瓦利德·哈达德说。“我们在内阁里有最多 6-8 名部长。”

尽管如此，一般大众还是认为，许多部长——包括内政部长希沙姆·甘迪勒在内，都不是同情兄弟会的人。前兄弟会成员也说，自由与正义党——通常独立于政治运动——其实都从伊赫瓦尼组织处获取命令。反对穆尔西者也说，虽然他辞去兄弟会职务以示独立，但还在领导沙特尔和兄弟会指导委员会。

不意外，自由与正义党否认这说法。“这是弥天大谎”，该党选举小组前成员说。“他听取他们的意见，每天每时都在听取。但是他不唯唯诺诺。他不盲从……这很正常，不过就是分享观点，实在不意味着穆尔西只会听从他人安排。”



“我们是有伊斯兰背景的公民政党”，哈达德说。“我们不会只考虑穆斯林兄弟会”。他补充道，就算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合法指派重要职位给盟友：“英国执政党也都有自己的纲领。”

另外，兄弟会证明，该党目前为止，还无法在埃及这个僵化的国家机器里实施任何类似的纲领，更不用说伊赫瓦尼组织了。警力就是个例子，兄弟会成员说。许多埃及人更愿意看到安全部门进行改革，他们的残暴逼迫2011年民众起义，可是穆尔西到现在还未究其责任。但他的盟友说，穆尔西是受制于穆巴拉克时代的警察系统遗老。所以，权利活动家得到就是这样的回答：从独裁时代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兄弟会，不会把改革当作要务。

“不仅是他没有作出任何变革”，埃及人权观察负责人赫巴·莫拉耶夫说，“他还不愿公开承认警力存在严重滥用。”

兄弟会民兵也有许多传闻，以便绕开警察监视。兄弟会则力拒此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民兵”，哈达德说。兄弟会也可以对反对者这样说，因为他们周五在莫卡坦沙坡上殴打、拖行落单的兄弟会成员，至少想1名兄弟会成员开火。可是反对者也可以回应说，上周发生的事情是迟来的报复，以回击去年12月出现在总统府外的冲突，当时伊赫瓦尼组织成员据报拷打了游行者。

他人实在无法容忍伊赫瓦尼的宗教立场。埃及所有政治派别都信仰虔诚——不过大多数人都希望兄弟会（包括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派）能够让民众自己理解宗教。“说伊斯兰制造了这些立场，确实是误解”，埃及国家女性委员会发言人索德·色拉比上月在一场贬低女性的风波中说，当时兄弟会以伊斯兰的名义宣传厌女思想。“伊斯兰和穆斯林兄弟会不一样”，马哈·哈塔布戴着头巾在莫卡坦说。“2011年以前，我们认为兄弟会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现在认识到，他们不是。”

哈塔布一句话道破兄弟会长期面临的挑战。分析显示，2011年前，兄弟会诉求主要是超越世俗政治的肮脏游戏——渠道是通过埃及平民，以及补偿实施未经实验的伊斯兰主义。然而犹如哈塔布所说，伊斯兰主义在获得权力之后丧失了原本的纯洁——脱离社会工作，受到政府失职的玷污。“曾几何时，你可安心呆在兄弟会，而不用过问政治”，哈米德说。“当时的兄弟会就是教学，就是教育，就是社会服务。但是当下的兄弟会政治味太浓，这都在消费兄弟会。”

权力会成为兄弟会的命门吗？帕吉特认为不会——或至少现在还不会：“政治运动还是要依赖选民，因为他们要站对立场，要有政绩。”没错，她说，“他们联系群众的通道，非伊斯兰组织都没有。”



可根据哈米德的观点，兄弟会最大的选举威胁不是非伊斯兰政党，而是伊斯兰组织，象是强大埃及党，或是萨拉非派组织。“如果你是年轻的埃及宗教信众，就会想加入运动，你可以希望呆在兄弟会里 10 年左右”，哈米德说。“然而现在的兄弟会政府备受争议，你能感觉到：好吧，他们政治味太浓，我可能应该考虑萨拉非派，他们没那么深陷政治。”

哈米德说，如此难题是兄弟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你如何平衡宗教运动的要求，和特定政治对象？”对于上月 25 名困在埃及高地清真寺的兄弟会成员来说，答案一定相当痛苦，明晰。这的确非常困难。

•穆斯林兄弟会等级森严，注重服从：“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号称百万成员之一的开罗兄弟会成员说，“然后你就能够晋升”。

•通常，他们的行动都有穆尔西德或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迪指挥。但根据内中人说，真正的权力由巴迪副手之一沙特尔掌控。他是超市大亨，留大胡子，沙特尔据报从新千年起就开始运筹帷幄——甚至在服刑期间也不中断。

“穆尔西德就是个普通人”，中层兄弟会成员解释道。巴迪的责任主要是宗教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沙特尔掌权了 12 年”，沙特尔的影响力部分来自金钱，以便为兄弟会提供金援——他也因此获得绰号：财政部长。

沙特尔是 20 名副手之一，他们又来自更大的 180 强人咨询委员会——这些成员制定兄弟会日程。

学术水平能为寻求委员会职位的人加分。有学位会外语的人更受委员会欢迎。

•委员会之下有几个等级：从区域首领导负责市区的人，甚至是管理临街事务者。每个在地部门每周会面一次，区域事务讨论每 3 月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每 6 月举行一次——“取决于沙特尔的时间安排。”

•组织内的新星得到鼓励扩大阅读。“他们每周给我一本书”，一个成员说。这些书分析《古兰经》，扩展读者见识。“他们还跟我讨论这书。”

•兄弟会通过其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参选，它通常比较独立。不过自由与正义党党员和前领袖都说，该党十分依赖兄弟会。“沙特尔有眼力”，一名党员说，“穆尔西没眼力。”

（翻译： endhx）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4 陈季冰：“旧邦维新”之难——十字路口的埃及（下篇）



陈季冰，专栏作者，上海商报副总编辑，著有《下一站：中国》。

“联合起来反对一件事情是相对容易的，联合起来达成一项建设性任务却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因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未来它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忙于相互指责而非开启新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埃及的“旧邦维新”之路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

对于那些将“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埃及的最新乱局提供了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

自 7 月 3 日军方罢黜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总统职务以来，在埃及各地，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与军警之间已连续发生多起暴力冲突，造成近百人死亡，逾千人受伤。更令人感到不祥和担心的是，军方在未出具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逮捕了数百名伊斯兰主义者，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多位核心领导人。我们却没有听见埃及自由派提出过什么异议，他们之前曾为了捍卫“自由权利”而坚决抵制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宪法和政府。这样一来，埃及的政治斗争便重又回归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以前的旧模式。

但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收回去。由于表面上的“稳定”已经打破，埃及社会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分裂之中。

而在国际上，埃及的政治变局将舆论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民主派”认为，试图维护独裁统治的埃及军方发动了一场粗暴践踏民主的政变；“宪政派”则一口咬定，是穆尔西及其党派妄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军方的行动是在捍卫自由。

的确，不管怎么说，政变就是政变，这种危险的先例一点都不鼓舞人心。在一个拥有稳定宪政框架的正常的民主国家，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如果总统肆意妄为，违法行使权力，可以启动弹劾程序。但在剧烈转型的埃及，各项制度建设百废待



兴，宪法和相关法律本身尚在争议重重的修订之中，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总统的施政是否超越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力进而对他提起弹劾？因此，试图以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坐标去定位埃及的现实，无异于刻舟求剑。

除了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对立论调，中国互联网上还弥漫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论，它坚称，是美国政府的“黑手”在幕后操纵了这次兵变。同样是这群阴谋论者，在两年前也曾义愤填膺地指责美国煽风点火，策动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这令像我这样自认为拥有正常心智的人不禁纳闷：美国政府在自己拥有重大利益的地区挑动社会不稳定，而且前后行为相互矛盾，是不是因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中国的这些业余国际政治观察家的智商更低？

在我看来，两年半来的埃及政局走势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联合起来反对一件事情是相对容易的，联合起来达成一项建设性任务却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因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未来它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忙于相互指责而非开启新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埃及的“旧邦维新”之路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

从投票站到解放广场

条条大路通往解放广场。

如果作一个简单回顾的话，开罗的青年会发现，过去两年多来自己不断地往返于投票站与解放广场之间。的确，兴奋的选举与愤怒的示威主导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生活。

2011 年 3 月 19 日，也就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不到 40 天，埃及选民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军方公布的宪法修正案，从而为未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不过，正是这份着眼于应付选举而未对许多根本性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修正案引爆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政治纷争。世俗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首先打破之前推翻“法老”时的“和谐”，呼吁民众投票否决这份宪法修正案，他认为，需要有足够时间让分散无序的反对派组建政党，以备日后参选，急于举行选举只会让旧政府的残余势力或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团体获益——众所周知，军方正控制着政局，掌握了埃及社会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而穆兄会则几乎是唯一拥有良好组织的反对力量。

但 77%的人投了赞成票，令自由派一败涂地，巴拉迪的预言很快便不幸言中。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军方绘制并公布这份草率而混乱的过渡路线图，正是为了达到巴拉迪所反对



的目标——让旧政府的势力在未来选举中获益；而穆兄会全力支持这一路线图，也是因为它从中看到了有助于让自己迅速掌权的重大契机。但这却埋下了日后一次比一次更加尖锐的政治纷争的引线，事实证明，这份草率的修正案后来成为军方和穆兄会日益沉重的负担。

从 2011 年 6 月底开始，越来越多认为民主梦碎的埃及人再度回到解放广场，抗议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迟迟不向人民交权。这场被称为“二次革命”的抗议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的议会选举之前，陆续造成了数十名平民死亡，几千人受伤。它一度被认为是埃及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人们开始挑战军方的权力。许多人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并非穆巴拉克，而是他所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他们从质疑军方的恋权逐渐转而质疑 1952 年纳赛尔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军方强势主导政坛的埃及整套权力结构，一手策动穆巴拉克政权谢幕的军方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帅第一次被民众高呼为“独裁者”。

反对派指控说，自军方执掌大权后，他们拿出了比穆巴拉克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硬的态度镇压抗议者。仅在 2011 年 1 月底到 7 月底，被军事法庭处理的平民人数就上升至 1.2 万，而整个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不过两千人；与此同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从对穆巴拉克阿谀奉承变成了歌颂军方的“喉舌”；2011 年 12 月 29 日，埃及警察还突击查抄了 17 家国际民主、人权机构驻埃及的办事处，其中包括美国赞助的多家机构，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在这次挑战军方权威的“二月革命”中，还醒目地出现了埃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妇女示威抗议。一则流传于互联网上的视频令人震惊地显示，两名士兵将一位女性示威者拖倒在地，不仅粗暴地对她拳脚相加，还将她的衣服扒至露出内裤……这一暴行不仅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起了愤慨，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烈谴责。

2012 年 2 月 2 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发生了一场导致 73 人死亡、千余人受伤的严重的足球骚乱事件，更令军政府声誉扫地。民众质疑军方保证稳定和安全的能力，而这本是其在过渡时期掌控权力的基础。一些人甚至指责军方故意制造混乱，以其维持对国家的控制，延迟民主化进程。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军方不得不承诺加快交权，修改旧的选举法，并结束不得人心的紧急状态法。但坦塔维依然强硬地表示，军方将在新宪法中保持原有地位。“军方的地位在上一部宪法中是这样，在当前的宪法中是这样，在下一部和以后的宪法中都会是这样。”

2011 年 11 月 28 日开始的议会选举，被认为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真正拉开了埃及民主的序幕。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与其说这次议会选举拉开了埃及民主的序



幕，还不如说它拉开的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斗争的新的一幕。这的确是一次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公正的选举，投票率也出奇地高。然而，正如巴拉迪所担心的，由于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力量中几乎唯有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雄厚的资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长期经验，这次选举仿佛就是专门为它度身定制的。选举结果显然不具有代表性：点燃革命之火的年轻人最终只赢得了有限的几个席位；占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议会中得到的席位不足 2%；占埃及人口总数约 10%的科普特基督徒只拿到了少于 2%的席次；而连同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在内，伊斯兰主义者赢得了压倒多数的 70%席位。

在议会选举结果的阴霾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下，2012 年 5 月和 6 月，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民主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一年多来与伊斯兰主义者争执不断的世俗自由派大多选择了给穆斯林兄弟的候选人会站脚助威，他们希望携手穆兄会共同遏制军方对埃及新政治体系的控制。老资格的反对派人士哈桑·纳法阿的话代表了自由派的心声："我们并不支持穆尔西，反对沙菲克（受到军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理），我们支持民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企图无限期地操控并扩大权力。这完全是反民主的。"

然而，在 6 月 17 日第二轮（决胜轮）投票的前 3 天，军方任命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突然裁定，议会下院三分之一的议席因违宪而无效。这实际上相当于解散了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令埃及全国上下在选举前陷入空前混乱。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能够阻止穆尔西赢得足够的选票去击败沙菲克，于是，在投票站关闭后不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补充宪法声明，收回了立法权，重新界定了总统的权力，并把对所有军事事务的最终发言权都留给了自己，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军方的支配权力。

这些举动再度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由与正义党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军方的宪法补充声明。穆兄会称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变"，并组织万人大游行表示抗议。

挑战、清洗、扩权、垮台

面临大权几乎由军方独揽的困局，穆尔西开始了对军方的大胆挑战。他上任第九天就下令恢复议会并举行新一轮宪法公投，虽然在遭到最高宪法法院否决后作出了让步，但一场穆兄会与军方之间的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就此展开。

穆尔西很快就等来了机会，更准确地说，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穆尔西及其穆兄会一旦掌权，便很快地展示出其老练的政治手腕。

8 月 5 日，一股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在日出开斋之时袭击了位于加沙边境的一个埃及军队哨所，杀害了 16 名士兵并夺走两辆装甲车，随后遁入巴勒斯坦。据以色列情报官



员透露，他们事先获悉可能会发生袭击，并将情报转交埃方。埃军情报首脑莫瓦菲将军也公开承认他向国防部长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沙米·阿南将军汇报过。

这一事件让公众在怒不可遏之余对军方的战备状况和执行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穆尔西总统在几天内果断罢免了军方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北西奈省省长，并趁机更换了总统卫队司令和负责开罗安全的军事指挥官。

8 月 12 日，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埃及军方第一号人物、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担任国防部长达 21 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及其副手、总参谋长阿南将军被宣布“光荣退休”，一并被解职的还有军方主要部门、海空各军种的多位首脑。受命接替坦塔维的是现任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勒·赛西将军，按惯例，穆尔西授予坦塔维和阿南最高勋章，并任命他们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这一次针对军方的重大清洗距离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不到两个月，而在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坦塔维领导的军方最高委员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政局。至此，埃及过渡阶段的军权也已似乎掌握在了穆尔西总统手中，一些原来对被军队重围之下的穆尔西不抱多少希望的人现在从他身上看见了当年精明强干的萨达特的影子。

以埃及军方在一年后的政变中展示出来完好无损的实力来看，穆尔西当初要解除一位在国防部长位子上稳坐了 20 多年的军界强人的职务，恐怕绝非表面上看似那么容易。至少不像穆斯林兄弟会宣称的那样，这是因为“穆尔西的命令代表了三千万埃及人的心声。”因此，与其说这是穆尔西的一次成功的放手一搏，不如说它更象是军方与穆兄会政府之前的一次默契妥协——审时度势的坦塔维用个人的隐退换取了声誉日下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和利益的保全。

外人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窥探穆尔西当时与坦塔维达成了一份怎样的协议，但这却是我所看到的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中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妥协。

本来，穆尔西如果见好就收，借助其通过漂亮果断的“勋章释兵权”行动换取的巅峰人气推动埃及的政治和解，着手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工作、并利用穆兄会的高效社会网络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令人信服的实效的话，他的确有可能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施政赢得更稳固的民意空间。但或许是被压制了几十年的穆兄会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渴望太过强烈的缘故，穆尔西决定趁热打铁，一举扫除自己未来权力之路上的所有障碍。

2012 年 11 月 21 日，穆尔西总统下令取消 6 月 17 日军方颁布的宪法补充说明，并公布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说明。根据这份说明，过渡阶段政府将不受司法审查；如果现



有制宪委员会因故不能完成任务，总统将在 15 天内任命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新的制宪委员会；而制宪委员会应自建立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宪法起草。

这份后来遭到强烈抗议的“扩权令”实际上赋予了总统及其所做决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限权力，理所当然地遭到经历过上一次革命“启蒙”的许多埃及民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自己刚刚赶走一个靠军队撑腰的独裁者，转眼又迎来了另一个声称带来真主启示的更加令人不放心的独裁者。

自 2012 年 11 月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埃及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并要求废除扩权令。虽然穆尔西政府做出了部分妥协，强调该法令只是临时性措施，实施范围有限，但依然在随后举行的公投中强行通过了强化伊斯兰主义的新宪法草案。尽管数据显示有 64%的投票者投票支持这部新宪法，但由于遭到自由派和基督教徒的抵制，仅有 33%的合格选民参与了这次公投。公投加剧了埃及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甚至数名穆尔西政府要员——其中包括副总统马哈茂德·马基——宣布退出政府以示对公投的不满。

到 2013 年 1 月穆巴拉克被推翻的纪念日前夕，反对穆尔西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骚乱，穆兄会位于开罗的总部遭纵火。而几个月前发生伤亡惨痛的足球骚乱的塞得港，抗议者第一次打出了穆尔西是“真主的敌人”的标语。

今天回头再来审视，正是这份“扩权令”以及随后强推的宪法公投和议会选举拉爆了埃及政治纷争的引线。它不仅坚定了自由派与穆兄会“一干到底”的决心，也将不少原本投票给穆尔西的中间派乃至伊斯兰教徒推到了穆尔西的对立面。它还给了士气受挫的军方借民意翻盘的机会，并直接导致了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政府的最后垮台。

穆兄会的失败与伊斯兰主义

我曾在本文的上篇中指出过，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失败根植于他们一开始便对这场“阿拉伯之春”革命所作出的一厢情愿的错误理解之中。在掌控议会和政府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忙于巩固自身权力，几乎全然无暇回应革命的发动者——埃及中产阶级群体——的要求。

穆尔西就任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后，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一付怎样的烂摊子——

持续的政治动荡对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埃及经济和财政状况造成了新的毁灭性的重创：由于资金持续流出，埃及的外汇储备已经从 360 亿美元迅速消耗至不足 150 亿美元，只能勉强再维持到 3 月；财政赤字达到 225 亿美元，约占 GDP 的 10%；制造业的开工量不足 50%，约有 1000 家工厂已经关闭；旅游收入因国内政局不稳和暴力事件增加而骤降一半多；外国直接投资停滞和撤离，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 12%以上；在 GDP 增长率从 5%以上下



降到 2%的同时，通胀率却攀升至 18%……用当时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的话说，他觉得在自己那个职位上“简直像一个犯人”。

除此之外，革命之前的埃及政府为了“维稳”的需要，每年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维护一种奇怪的国家补贴制度。尽管这种国家补贴制度名目繁多而低效，但毕竟让不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例如燃料和面粉的价格稳定地保持了几十年没变。政治动荡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加之随后的财政危机，使得政府无力继续大规模地推行国家补贴政策，市场上享受国家补贴的商品供应日渐枯竭。

本来，在这种堪称“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穆尔西政府应当在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经济秩序的重建，并对积弊重重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这才是这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即反对特权，争取普遍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也只有在这方面有力地回应了民众的呼声，风雨飘摇中的新政权才会在民众心目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从而也才有机会同以军方为代表的特权利益集团展开持久的博弈。

但这显然不是穆兄会所擅长的，作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长期的反对派身份使它缺乏一套只有执政者才需要认真考量的处理经济问题的一贯理念和政策方案。穆尔西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国内自上而下施行的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把消除贫困看做是一项慈善工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既秉承了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也是穆兄会在过去长期深入开展社会服务的思想遗产。为此，自由与正义党政府甚至试图规定将“扎卡特”（zakat）——即伊斯兰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规定为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这不仅丝毫于事无补，还毫无必要地招徕了世俗主义者的强烈疑惧。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穆兄会表现出来的反美和反以政治倾向，旧政权时代高度倚重的来自美国的财政援助也变得岌岌可危，一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 48 亿美元的至关重要的贷款也因为许多原因被搁置……

所有这一切，使得穆尔西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失败。穆尔西的铁杆支持者也许可以辩护说，他所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腐败的体系，这些都不是他的错，相反，他本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况且他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权，他需要更多时间……等等。这些理由都是相当充分的，但民众并不会因此原谅和同情一个失败者和受害者，因为他们将他送上权力宝座，就是期待他来改变这一切的。

而从另一方面看，穆尔西一直在强调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和穆兄会也许认为，选战胜利赋予其在政策决策中自行其是的权力，因为是选民授予了自己改变社会行为的权力。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子实际上是那么脆弱，并且也严重误判了埃及社会的多元性和推翻旧秩序者的决心。

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考虑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客观和公允地分析人们众说纷纭的关于穆兄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问题。

鉴于穆兄会过去一贯坚持的那套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加之它为了争取萨拉菲派支持而作出的姿态，无论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基督徒还是外部世界的美国和以色列，对它的掌权产生不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人们一方面希望穆尔西成为“曼德拉第二”，另一方面是举着放大镜来看他和他的党派的一举一动的。

穆尔西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候选人”、“《古兰经》就是我们的宪法”；他当选后也将转变与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作为埃及的重要对外政策，并宣称要“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但他在当选之初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将保证基督徒和妇女的完全权利，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政府，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还会任命一位基督徒和女性担任副总统……

穆尔西政府上台以后，发生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许多领域里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一些规定禁止亵渎神明和进行侮辱，并允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媒体实施审查；一位脱口秀主持人因为涉嫌侮辱总统而被判处 4 个月监禁，据说 6 个月内，由于污辱穆尔西而受迫害的记者人数超过穆巴拉克近 30 年统治期间受迫害的记者人数。

然而，仅凭这些我们不能下结论说，穆兄会已经推行了多少试图使国家政治伊斯兰化的政策。但自由派的担心也是必要和正确的：必须在它取得过去穆巴拉克那样的绝对权力之前就果断扑灭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一旦穆尔西的“扩权令”得逞，事态就有可能朝那个方向发展。

确实，穆巴拉克倒台后，并不仅仅是追求自由权利的中产阶级和青年人得到了解放。在革命之前，许多埃及人——其中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巴拉迪——几乎都不知道色拉菲主义的存在。突然之间，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色拉菲发言人的讲话。受到来自保守的沙特阿拉伯资金支持的萨拉菲派现在公开鼓吹绝对遵守伊斯兰法，避免伊斯兰教的一切“革新”。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发表一些强硬提议——包括设立宗教警察、禁止公共娱乐活动、禁酒、强制女性佩戴面纱、对基督徒征收历史上的特种税……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自然引发了埃及开明派和国际社会的恐惧和不安。

2011 年 5 月至 10 月间，开罗连续发生多起保守派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而在 2012 年元旦那天，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科普特教堂制造爆炸案，致使 21 名礼拜者当场丧命……这些愈演愈烈的恶性暴力冲突无疑加剧了世俗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对伊斯兰主义者把持的政府的怀疑和害怕。



但实际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同意一位埃及科普特主教所分析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是国家治理的崩溃。

结语

开罗街头目前正在上演的的这场政治变革至今仍未结束，它的意义或许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浮现。但作为阿拉伯世界怦然跳动的心脏，埃及革命已经为整个中东地区打开了一扇再也无法关上的大门，虽然前方的路途难测。推翻一个可恶的独裁者并不难，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却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也许花一代人的时间都难以彻底完成。

未来，在主导埃及政治的最重要的三方力量中，军队在维护国内局势、阻止国家滑向极端主义的过程中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它也的确是在笨手笨脚地摸索着，例如它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试图披一层法治外衣、通过掌握“立法权”和“释法权”来影响政治的意愿——毕竟，频繁发动政变是一件有损于军队声誉且成本越来越高的事情。因此，预计军队未来将更多地躲在最高宪法法院的身后行动。

但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近 60 年的军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一个试图维持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体制”将是徒劳的。的确，埃及人民尽管可以赶走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他们却很难瓦解军队在埃及政治体系中异常稳固而且盘根错节的控制力。但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埃及人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卷土重来的军事独裁面前逆来顺受，2011 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便是明证。为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军队必须尽快完成现代转型。

埃及的民主还需要容纳伊斯兰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过去几十年的残酷镇压都不能将它赶尽杀绝，新世纪的一次兵变就更不可能让它从此一蹶不振了。未来的选举必须给予穆兄会以平等的机会，否则，主流的伊斯兰主义者将被赶回地下，而某些极端派别很可能放弃民主途径，重拾暴力手段。类似的苗头已经出现，许多兄弟会成员深信自己是旧政权和旧体制“复辟”的受害者，他们宣称将无法控制年轻人的激烈情绪。

但就穆斯林兄弟会自己来说，尽管有多年秘密反对派活动的经验和组织良好的全国性网络，真正走到台前领导正在变革中的埃及也绝非易事。一位穆兄会高级负责人曾承认，遭到群众而不是政权的反对，这在兄弟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相信这足以激发他们的震动和反思，未来的穆兄会也必须尽快完成由一个宗教性质的半地下组织向开放的现代政党的转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首先必须清晰地认识并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在一个现代社会，一切政治权力来自人民而非真主。

对于世俗自由派而言，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从过去的一盘散沙和内部争斗中走出来，迅速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团体并开展有效的工作。此外，受到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他们还必须



认识到，在一个拥有 1500 年伊斯兰教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试图实现全盘西化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未来的埃及注定仍然是一个穆斯林社会。

其实，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一种原教旨的心态追求这种教义并将它强加于人。只要有了一个稳定法治框架，伊斯兰文化只会有利于丰富未来埃及的民主政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派应当努力主导在立法和选举之前首先想办法通过一个宪法原则，它可以取美国权利法案的形式，规定一些不受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保障种族性别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任何法案，只要违背这些原则，均不得通过，这样便可一劳永逸地解除民主政治带来的神权复辟威胁。

最后，所有的埃及人都应该认识到，一旦各方停止合作，转向全面对抗，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5 谢里·伯曼：埃及应吸取马克思的教训


谢里·伯曼，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著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社会民主与二十世纪欧洲的形成》。

>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写道，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他想到的是 1848 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当时，反对王朝的民主起义分崩离析，一切以拿破仑党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与 60 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别无二致。

1848 年，法国工人与自由党人携手进行民主反抗活动，推翻了王朝。不过，旧秩序刚一覆灭，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要求“激进”，并对此越来越警惕。于是保王党招安了心怀恐惧的自由党人，建立了新型专制统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样的戏——自由派和威权派本色出演，而伊斯兰派则充当了当年的社会党人。又一次，缺乏经验和耐心的群众运动在夺权之后因不自量力而失败。又一次，自由派被他们曾经的伙伴的变革诉求吓倒，转而乞求旧政权的保护。与 1848 年一样，威权派也乐于重新掌权。

如果埃及军方将镇压继续下去，而自由派又继续予以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正中马克思当代后继者的下怀。“全世界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道，“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将是正确的。

埃及自由派曾与伊斯兰派携手推翻了威权政权，短短两年之后，自由派却恳求军方发动政变来终结该国的首次民主尝试，但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一国政治进程的前期，除了推翻旧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没有其他共识。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



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1848 年是“民众之春”的鼻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诉求吓坏了自由派。中产阶级期望经济自由化；许多工人要求更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自由派青睐有限开放的政治体制，而工人团体希望能全盘民主化，并能掌握由此带来的权力。当情况变得清晰，即工人和社会党人可能会赢得胜利，自由党人却退却了，回到了保王党的怀抱之中，认为恢复威权体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情。多年的威权统治意味着，允许民众和平地表达异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系统性压制。政府还有意加深社会分歧。因此，当民主到来的时候，长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敌意以极端的言辞、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暴力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东西往往会吓坏自由派，因为他们青睐秩序和温和，厌恶极端的社会实验。1789 年和 1848 年的欧洲是这样，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这样。

问题是，面对这种恐惧，自由派应该作何反应。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于 20 世纪末期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极端主义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团能够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且，这也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制度，更何况还有欧盟(European 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极端主义的威胁让自由派恐惧，由于历经多年威权统治，这些国家缺乏妥协文化，也没有一个奉行民主的强大邻国来引导他们。

1848 年的惨败以温和派消亡为代价，强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元素，在自由党人和工人之间划下一道经久不愈的恶毒创痕。当自由党人抛弃民主，温和的社会党人看上去就象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扬非民主策略的激进分子变得越来越壮大。1850 年，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London Communist League)，说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即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赢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他们继续警告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兰派吸取的教训。

自由党人在 19 世纪的欧洲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党人都看成了极端分子。然而，虽然有部分社会党人是极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对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不是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改革。然而，在极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自由派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区别；他们反对全盘民主化、积极地镇压整个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开始质疑，为什么工人们要加入一个不愿对他们可能获取的胜利予以认可的制度。当社会党人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接受了和保皇党之间肮脏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权力之外。结果就是，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对手视作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决意废除自由派珍视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现在存在乐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温和伊斯兰派，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伊斯兰派依然是埃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和自由派盟友要让伊斯兰派明白，在该地区民主化的未来中，伊斯兰派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会的分歧会增大，温和的伊斯兰派会变得边缘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会陷入泥沼。

1848 年过去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乃至温和的保王党最终联合起来，在西欧创建了稳健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本应建立得更早，并且经历更少的暴力冲击。中东的自由派必须从欧洲的动乱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辙。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鉴】

9-6 林达：一个首相的故事

林达，美籍华裔作家夫妇。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

西班牙首相体制内推动和平政治改革的故事

1975 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 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 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一、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 1939 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



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个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 37 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 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 43 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 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 “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 36 岁，一个 31 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 1975 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 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 1976 年 9 月到 1977 年 6 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 年 9 月 8 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 年 10 月 8 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 票赞成，15 票反对，13 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 年 12 月 16 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 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 180 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 年 2 月 27 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 年 4 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 38 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 6 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 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 20 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

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 20 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 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 1973 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 40 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



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 1978 年 1 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 1,333 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从 1978 年 5 月起，国会宪政委员会的 36 个委员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这是非常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了分裂的边缘。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用无出路。

可是，5 月 22 日，委员会在教育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天晚上，左右两大党的四个代表，在何塞? 路易斯饭店会谈。左右翼的另外两党，左翼共产党和右翼人民联盟则预先表态，不管这何塞?路易斯之夜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将签字，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制宪必须成功，协议必须达成，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就会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第二天清晨，这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 148 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 1342 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 6 月 20 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 年 10 月 31 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 月 6 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68%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 7.2%投了反对票。12 月 27 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 1979 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 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 50 岁。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 年 2 月 23 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 2005 年 3 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7 阿斯兰：伊拉克："民主"不容易

>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阿斯兰，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尽管时快时慢，但伊拉克的一切仿佛是按"时间表"运行的。尤其是和时下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正在上演的无序相比。

2011 年 12 月 18 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进入科威特。美军完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保证的"严守撤军时限"的承诺。

把时间往前推，8 月，美军作战部队脱离战斗启动了正式撤军计划。

2010 年 3 月中下旬，325 位伊拉克议会新当选议员们选举出了总统、总理。

3 月 7 日，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伊拉克人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被视为伊拉克人真正开始掌握自己命运。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士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水泥掩体成为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AHMAD AL-RUBAYE/东方 IC/图）



选举，一个不错的起点



26 岁的穆斯塔法·萨巴赫在一家西方公司设在巴格达的办事处从事翻译工作。对于已过去两年的那次选举，他至今记忆犹新，“起码，我们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尽管最后当选的人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毕竟发出了声音。”他说。

那是一次顺利得超乎想象的选举。选举成功的原因部分得归功于萨达姆。拜萨达姆常年重视教育投入所赐，伊拉克选民整体素质较高，在没有国家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素质高的选民不会轻易为人左右，即使是恐怖组织的袭击也不行。

选举结果，没有一个阵营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前总理阿拉维、现任总理马利基和总统塔拉巴尼这三方所控制的议席数分列前三位。阿拉维阵营仅比马利基阵营多出一席。民主的第一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

选举过后，与很多刚刚走入民主阶段的国家类似，有关舞弊的传闻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责说，控制政府资源的马利基一方多印了数十万张选票作弊。压力之下，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次日对选举进行了重新计票，一个多月后的 2010 年 4 月 19 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所有的舞弊指控均被宣布为查无实据。

在伊拉克，投票是件可以让人失去生命的事情。投票日前夕以及当天，“基地”等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全国发动多起袭击，试图阻止人们去投票。

2010 年 3 月 3 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两枚汽车炸弹致使 33 人死亡，55 人受伤。

萨巴赫回忆，投票日当天，在他投票的选区——巴格达曼苏尔区，一枚炸弹导致 3 人受伤。一名轻伤男子在用沾满鲜血的手投完票后才去医院。萨巴赫说：“鲜血染红的选票，成为这个投票日给我最深的印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像萨巴赫一样为选举欢喜。年过半百的逊尼派人士会怀念萨达姆时代没有自由但有保障的生活。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的人口比重不足 30%。萨达姆时期，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受优厚的福利，可谓伊拉克的幸福族群。

53 岁的媒体工作者贾迈勒·艾哈迈德甚至说：“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很多行为守则，要求人们服从长者和智者的意志，多年形成的传统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

这让人联想起尚在混沌中的埃及与利比亚，对伊斯兰有了解的人都没有为独裁的结束而急于欢呼，都在观望，民主的急雨，究竟能浇灌出怎样的花朵？

伊拉克特色的茶馆议政

萨达姆倒台后，穆塔纳比街沙赫班达红茶馆里的辩论声大了起来。



穆塔纳比街位于巴格达城东，长约 600 米，宽约 3 米，以十世纪伊拉克诗人穆塔纳比的名字命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省政府位于这条街上。上个世纪初，这里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聚会所。

起初，街道的两侧开了很多小书店，接着，在书店外的街面上自发聚集了一些贩卖旧书刊的商贩，最后，逐渐形成了在巴格达乃至全伊拉克赫赫有名的旧书市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巴格达人具有喜爱读书的传统，同时又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一样嗜好饮茶。

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找书，还可以欣赏街道两侧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米色矮楼，逛累了，就到穆塔纳比街尽头的沙赫班达红茶馆小坐喝茶。由于茶馆聚集的都是文化精英，茶余难免把盏清谈，逐渐形成了茶馆议政的文化现象。

沙赫班达茶馆于 1917 年开业。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统治，英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将伊拉克纳入其殖民体系。从那一年起，巴格达的知识精英在沙赫班达茶馆举行"政治沙龙"，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议论风生。这逐渐形成了传统。在那一时期，茶馆议政的主题是"独立"、"反殖"。

在萨达姆时代，沙赫班达的茶馆文化也未中断，议论的关键词变为"民主"与"自由"。萨达姆的秘密警察经常"光临"茶馆，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知识分子随后被投入监狱。于是，有一个时期，茶客们将话题转向了文化和体育等软性话题。

不过，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下，仍会有人在沙赫班达茶馆出没，散发匿名材料，抨击萨达姆。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撤军"和"马利基政府"成为沙赫班达茶馆当然的主题。美军的行动，奥巴马关于伊拉克的表态，马利基政府如何擅权但不办实事，美军是否应该留下……都会激起茶客们的众声喧哗。

巴格达大学学生加尼受够了美军的存在，他只要在茶馆都会毫不忌讳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美军应该离去。过去这些年里，总是看见他们的车辆满街跑，直升机在我家上空飞过。我受够这一切了。"

加尼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占领，尤其是视尊严为生命的阿拉伯人。他甚至表示怀念萨达姆统治时期，"至少那时我们有尊严，没人看不起我们"。



63 岁的什叶派学者布尔汗算是加尼的“同盟”，老人家的观点鲜明——美国方面声称留驻伊拉克是为了帮助伊拉克进行安保，但其实，美军恰恰是造成伊拉克安保危机的因素。

布尔汗说：“他们（美军）对武装组织拉一派，打一派。打击反对占领的武装组织，又训练、支持亲美的武装组织。而且，他们的存在为武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创造了借口。”

逊尼派的商人优素福·阿比德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人走了，可能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白。“我们的邻居，好比伊朗……”他说。

阿比德代表着为数众多伊拉克逊尼派民众的想法。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的伊朗太过接近，将来会导致伊拉克政局被伊朗所控制。而美军的存在，则可以对伊朗起到制衡的作用。

现在，常常有不同政治派别的“宣传手”在沙赫班达茶馆，散发反对马利基总理所领导政府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指责马利基政府行政效率差，腐败现象严重，应当对伊拉克目前糟糕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负责。

“宣传手”们脚步轻捷地在茶客间穿行，并不多话，但一阵一阵声浪伴随着茶客对小册子阅读而被激起。

伊战爆发 8 年后，伊拉克知识精英不仅在穆塔纳比街和沙赫班达茶馆，他们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发出声音。然而，这样的自由空间笼罩着新的阴云——“恐怖主义”。

沙赫班达茶馆的茶客多数不愿公开姓名，即便讲也不愿讲出全名。他们主要担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2007 年 3 月，穆塔纳比街遭遇炸弹袭击，导致近 30 人死亡，另外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沙赫班达茶馆老板哈吉·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

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拉克政府短暂封闭了穆塔纳比街，直到一年后的 2008 年才重新开放。

那次恐怖袭击的前后，哈吉·穆罕默德都经常收到恐怖组织发来的威胁信，要求他停业，声称茶馆业务与伊斯兰教义冲突。

之后，茶馆改全天营业为上午半天营业。原因是，午饭后，在穆塔纳比街执勤的军警陆续下岗，容易造成安保空虚，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提供机会。



另外，茶客也担心，有恐怖分子混迹在茶馆中，一旦他们的相关言论与恐怖组织观点不一致，也可能为发表言论者带来危险。因此，为防止被恐怖分子盯上，熟悉的茶客之间虽然交流起来毫不避讳，但和陌生人交谈时他们都十分小心，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与姓名。

民众的声音必须被聆听

在距离沙赫班达茶馆大约十分钟车程的自由广场，民众集会已经成为每个周五礼拜日的常例，让人联想起开罗的解放广场。这在萨达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情形。

46岁的媒体工作者夏兰•祖拜里说，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无权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如今，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任何想法，但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聆听。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其实，萨达姆政权同样具备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施政架构。总统萨达姆与国家部委之间，设立了有二十多人规模的国务委员会，萨达姆兼任委员会主席。按规定，国家大政方针应由国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

而实际上，萨达姆在委员会中说一不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是走过场与橡皮图章的作秀。

今天，伊拉克在选举基础上建立起内阁总理负责制，但种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让人感到，这仍是完全与民主无关的角力。

2010年11月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为库尔德人、马利基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以及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团体三方瓜分政治利益的谈判桌。最后，马利基勉强获得组阁权，保住总理位置，但为了妥协与平衡，新政府竟设立多达46个部长职位，以满足各路势力的权力需求。

庞大的官僚系统永远与高效或廉洁无缘。马利基在最关键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安全部长3个职位上，迟迟不肯做出任命，把住核心权力不放。恶果是导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据非官方统计，2011年伊拉克全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恐怖袭击事件，首都巴格达更是每天都在爆炸与枪声中度过。而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渐露端倪。



库尔德人、马利基阵营与阿拉维阵营三方杯葛造成政治上互不信任，有时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2011 年 6 月份采访巴格达省省长拉扎克，就出现三重保安的奇景：库尔德人枪手负责院墙外警戒，阿拉维派武装人员负责院墙内警戒，马利基派武装人员负责随身防护（拉扎克属于马利基派）。只有各派均派出安保人员的情形下，才能确保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假使某派安保人员缺位，该派的武装人员就可能作为袭击者向安保对象下手。这就是伊拉克政治乱象的一角。

除了“安全”与“效率”，“电荒”是另一个可能引发恐慌的议题。伊拉克正在利用一年中难得的凉爽的日子，加紧谋求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比如与外国企业合作建造发电厂，向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买电，还采取优惠政策，发展私营发电机。

等到漫长的夏季来临，巴格达的骄阳足以燃起民众的愤怒。

有关电力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涉嫌贪腐的传闻一直不绝，甚至几度传言马利基已经将其免职，过后总理办公室又出面辟谣。多数民众认定，电力部门不作为，电荒实乃人祸。

回到自由广场，人们的诉求贴近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人们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得到聆听，能不能得到尊重。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8 何桂全：缅甸吴登盛“协议转型”

“

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国家转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政府与少数民族政党和武装组织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协议转型”的各方相互妥协，减少分歧，避免冲突，是保证改革平稳、顺利推进的关键。

”

何桂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吴登盛出任缅甸联邦总统以来，推行的改革前所未有，令世人震惊，但改革既非吴登盛个人的即兴之作，亦非缅甸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是一项长期战略。虽然面临如何提高治理水平、真正实现民族和解、避免落入“资源诅咒”陷阱等难题，但缅甸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2011 年 3 月吴登盛出任缅甸联邦总统以来，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主动与政治反对派和解，推行民主改革；积极推动民族和解，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议；加强宏观调控，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注重民生。吴登盛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大胆改革令世人所料不及。在缅甸国内外，人们普遍对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其改革动机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怀疑其改革的诚意。本文在回顾一年多来吴登盛政府推出的改革举措的基础上，从国家转型战略的角度评析吴登盛政府改革的动机、难题及前景。

一、大胆务实的改革

吴登盛在就职演说中曾明确表示要推进国家民主转型，实现民族和解，强调要加强法治和善治，改善国民的基本公民权以及社会、经济、教育状况等。他的这些主张与前军政府的立场明显不同，但当时缅甸国内外没有多少人对吴登盛新政府抱很大希望。“许多外交官、分析人士以及民主人士认为，新的准文官政府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然而，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吴登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改革措施。

在政治上，吴登盛政府采取和解的立场，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一是主动向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示好，说服其参与政府主导的政治进程。2011 年 8 月，吴登盛亲自与昂山素季进行会谈，并表达了真诚变革的愿望。吴登盛政府还提议修改选举法，取消了被判入狱者不得参加政党的“昂山素季条款”，使全国民主联盟得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



2012 年 4 月 1 日，全国民主联盟参加议会补选，一举赢得了 45 个席位中的 43 席，从而进入议会。昂山素季还历史性地被允许出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出访欧洲五国和美国。在最近访美期间，吴登盛公开称赞昂山素季，在谈到她成为总统可能性时表示，“如果人民接受她，我也必须接受她。”二是释放政治犯。到 2012 年 1 月，政府已释放了 300 多名政治犯；9 月 17 日，政府又释放了 500 多名犯人，其中至少有 80 名政治犯。三是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吴登盛上台不久，政府就开始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如缩小出版物的审查范围，开放 Skype、雅虎和 YouTube 等曾被禁止的网站。2012 年 8 月 20 日，缅甸政府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宣布取消新闻审查，9 月 17 日，又宣布成立一个更独立的临时新闻委员会，在新《媒体法》实施前进行行业管理。四是切实改善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2011 年 9 月，缅甸成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2011 年 11 月，吴登盛签署《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2012 年 3 月，新《劳工法》颁布实施。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昂梭（Aung Zaw）说：“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缅甸新政府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比前军政府二十年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多。”政治改革是吴登盛政府整个改革的最大亮点，它不仅开启了缅甸包容性政治进程，为实现全国和解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注重改善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展现了政府民主改革的决心。

在民族问题上，吴登盛政府开启了和平进程，倡导政治解决民族问题。2011 年 8 月，吴登盛公开呼吁所有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参与和平谈判，还成立了两个和平谈判小组，负责与所有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会谈。到目前为止，已参加和谈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除克钦独立组织外都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这些协议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四点：结束战斗，实现停火；建立联络处；在辖区外有军事行动须通知对方；未来举行进一步会谈。签署停火协议只是民族和解的第一步，吴登盛在 2012 年 3 月 1 日的议会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基于彬龙会议精神实现民族和解的路线图。第一步是在邦一级进行会谈，实现停火；第二步在联邦一级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会谈；第三步由包括政府、各民族领导人、各政党与各政治力量以及人民代表在内的所有政治参与者在议会签署协议，并以相互理解、平等和发展为原则，保证永久和平。目前第一步已初步完成，第二步已开始进行。5 月 17 日，缅甸成立了以吴登盛为主席的联邦和平中央委员会和以副总统赛茂康（Sai Mauk Kham）为主席的联邦和平工作委员会，以推动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和谈进程，争取实现国家的永久和平。

尽管民族和解路线图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要求仍有不少距离，但吴登盛还是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一是明确提出民族和解应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达成。这比少数民族要求的三方（军方、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少数民族）对话更具广泛性。二是明确提出互相理解、平等、发展的原则。路线图虽没有直接提及联邦精神、自治原则，但互相理解、平等、发展三项原则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切身利益要求。



在经济上，吴登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措施。一是鼓励出口。政府先后两次降低出口税，2011 年 6 月由 10%降为 7%，8 月再降至 2%。二是改善民生，增加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2011 年 6 月底，吴登盛政府宣布增加 2010 年 1 月 1 日前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每月最低退休金由 750 缅元提高到 2 万缅元。与上一财年相比，2012-2013 财年预算中教育投入增加了三倍，卫生投入增加了两倍，而军费开支则相对下降了，其占总预算的比率由 23.6%降到 14.9%。三是实行统一汇率制。长期以来，缅甸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并存，官方汇率一直固定在 6.4 缅元兑换 1 美元，2012 年 3 月黑市汇率则是 800 缅元兑换 1 美元，二者相差 120 多倍。3 月 28 日，缅甸中央银行宣布，自 4 月 1 日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官方参考汇率为 815-820 缅元兑换 1 美元。四是增加贷款，刺激投资。2011 财年，银行降低了利率，贷款利率由 17%降为 13%，存款利率由 12%降为 8%；2011 年 9 月，议会通过了《小额信贷法》，以扩大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此外，新修改的《外国投资法》即将出台，外国投资者将获得更多的投资优惠。

与政治改革相比，吴登盛政府的经济改革显得有些温和，但仍不乏亮点。一是改革举措务实。汇制改革改变了长期存在的混乱汇率，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修改《外国投资法》，改善投资环境，有助于吸引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二是注重改善民生和平等发展。提高公务员的退休金、增加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扩大对农民的贷款、刺激出口，既有助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也有助于平等发展。从实效来看，缅甸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过去四年平均 4.9%（2010 年为 5.1%）提高到 2011 年的 5.5%，预计 2012 年为 6%，2013 年为 6.3%；外汇储备由 2010 年底的 53 亿美元增加到 2012 年 3 月的 80 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好缅甸经济发展前景，称缅甸“有望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边疆”。

二、改革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

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改革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也不能确定是什么促成了改革。”不少人称缅甸的改革为“缅甸之春”，称吴登盛是“缅甸的戈尔巴乔夫”、“缅甸的德克勒克”。

尽管改革受到了外界的普遍欢迎，但人们对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动机仍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怀疑其改革的诚意。一些人认为改革主要源于吴登盛个人的推动。与吴登盛政府和反政府人士关系都不错的乃温貌（Nay Win Maung）说：“变革是临时性安排，没有过战略，它基于个人。”毋庸讳言，缅甸新政府的改革与吴登盛个人密不可分，但是，缅甸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军人直接或间接执政，新宪法也确保了军方的领导地位，因此单凭吴登盛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是吴登盛政府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一是为了获准担任201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二是为了让西方国家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吸引外资，维护军人集团的利益。融入国际社会和争取外资，是缅甸政府长期以来的愿望，并非吴登盛政府上台后才有的，而且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坚持了20多年，粉饰性的改革是不可能让西方满意的。因此，把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视为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缺乏充足的说服力。

如果从1988年军人执政后缅甸发展的轨迹考察，我们会发现，缅甸政府的改革既不是吴登盛个人的即兴之作，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吴登盛政府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是一项长期战略。

1988年军人接管政权后即开始改革，并明确提出向多党选举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军政府采取的是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坚持先制宪后交权。在1990年大选前，军政府多次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1990年4月12日，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第一秘书钦纽（Khin Nyunt）说："军方在选举后将继续执政，直到起草一部新宪法和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993年国民大会召开后，军政府明确规定了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联邦统一不分裂、民族团结不破裂、国家主权永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等。2003年，军政府提出的缅甸民主化进程七步路线图明确规定，先根据国民大会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细则制订宪法，再进行议会选举，组成新政府。2008年新宪法规定军队在议会中拥有1/4的席位，在法律上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1988年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纷争和动荡，军政府的国家转型战略推进得并不顺利，但缅甸国家的转型还是按照军政府的设想一步一步地缓慢推进：经济上，颁布《外国投资法》，鼓励和扶植私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贸易，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颁布政党登记法，废除一党执政，举行多党制大选，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进行议会选举，成立新政府。在推进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同时，军政府还试图化解民族矛盾，1989-1997年政府先后与17个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一些小的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从本质上说，缅甸军政府奉行的国家转型战略遵循的是印度尼西亚式的"国家领导发展的模式"（model of state-led development），强调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军队承担安全和政治双重职能。

2008年新宪法不仅明确了"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多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提供了宪法保障。吴登盛政府正是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的，其进行的改革显然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第一，吴登盛始终强调要在宪法框架内推进改革。吴登盛政府迄今为止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均没有逾越宪法，没有改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原则。第二，深化改革是为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提供合法性。2008年宪法公投和2010年大选被外界认为并非公正、自由，全国民主联盟拒绝参

加，因而军人集团虽然获胜，但胜之不武，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合法性广受质疑。寻求“政绩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做法，选择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军人集团自然希望新政府通过进一步推行改革做出政绩，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对军人集团来说，让吴登盛出任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吴登盛清廉、较少遭人憎恨、眼界开阔，能够在国内外树立好的形象；另一方面，吴登盛在军内没有根基，也没有野心，且忠诚、守纪、踏实，善于妥协，因而能够更好地推进改革。有不少人认为，丹瑞（Than Shwe）选择吴登盛推进改革，就是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改革是丹瑞军政府的既定方针。第三，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得到了议会的支持。没有议会的支持，吴登盛的改革是不可能兑现的，特别是一些法律是无法通过的。不仅如此，有些改革动议还是议会提出的。如人民院在军队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了反对派的动议，请求总统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说明，吴登盛政府的改革既非个人行为，亦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战略。

三、改革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

在任职周年演说中，吴登盛在肯定改革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坦言国家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迈更大的步伐”。事实也确是如此。

政治上，缅甸还远未完成向多党选举民主转型。在《经济学人》信息部2011年民主指数排名中缅甸在167个国家中位列第161位。修改制订一部真正反映民意的宪法，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缅甸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但是，吴登盛政府短期内不会面临来自民主派的巨大修宪压力。全国民主联盟接受吴登盛政府的和解立场，参与政府主导的政治进程，意味着修改宪法将按宪法规定程序进行。昂山素季说，“修改宪法，我们需要75%以上的议会赞成票，而军方在议会占有25%的议席，所以我们至少需要军方的一票，再加上其余75%的选票”，因此修改宪法很困难，它将是一项长远计划。如何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是吴登盛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在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治理指数中，缅甸总得分为19，远低于得分大都在130分以上的东盟邻国，甚至低于得分41的朝鲜。

吴登盛执政后缅甸国家治理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官僚机构能力不足。长期以来，缅甸一直是由军人直接或间接统治，军人几乎掌控了整个官僚机构，吴登盛政府虽然是文官政府，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实际掌权者绝大多数是军人或前军人，由此造成了缅甸官僚机构能力弱。一方面，部队的等级制、服从命令、高级官员任用靠任命等做法移植到官僚机构中，使官员们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中起决策作用的军人或前军人接受的主要是军事教育，他们不懂技术，特别是缺乏经济管理技能。就连吴登盛总统的一位重要顾问也说：“我们知道需要变革，但我们不知道哪些需要变革，也不知道如何变革。”二是法治不彰。自2002年以来，在世界银

行治理指数排名中缅甸在法治方面一直排在 213 个国家中最后 5%的国家之列。一方面，缅甸法律体系不完备，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建设需要的法律缺失，一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需要修改；另一方面，“缅甸缺乏独立、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而这不仅是向民主过渡所必需的，也是维护法治所必需的”。三是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在 2011 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廉政指数排名中缅甸倒数第三，仅排在索马里和朝鲜之前。缅甸民族院议长钦昂敏（Khin Aung Myint）坦承，“反对严重的腐败是当前缅甸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民族问题上，吴登盛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吴登盛政府虽然与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但要实现真正的全面停火并非易事。一方面，目前克钦独立组织还未与政府正式达成停火协议，并且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停火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武装力量如何安置仍是难题。在目前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是不愿轻易放弃已拥有的武装力量，而根据目前的宪法规定，国家只能拥有唯一的联邦军。对于缅甸民族和解进程来说，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才是关键。缅甸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少数民族领导人的诉求主要包括四点：（1）主要民族一族一邦，即建立由掸邦、克钦邦、钦邦、克耶邦、克伦邦、孟邦、若开邦和缅族邦八个邦组成的缅甸联邦；（2）联邦议会由权力平等的两院（民族院和人民院）组成，民族院每个邦均享有平等的代表权；（3）各邦自治，联邦政府除保留外交、防务、发行货币等权利外，其余的权利交给各邦，特别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4）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由各邦平均分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领导人所要求的联邦制和民族平等是建立在一族一邦和各邦自治之上的。对吴登盛政府来说，这两点难以接受。其一，缅族占多数的地区目前分为七个省，一族一邦意味着要彻底改变这种行政区划。其二，如果实行一族一邦，缅族无论在议会享有的代表权还是从联邦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分配的份额都会大为减少，而缅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2/3。其三，目前七个民族邦的面积约占全国领土的 2/3，且资源丰富，各邦如果按少数民族的要求实行自治，就意味着人口占少数的少数民族将占有更多的资源。

经济上，吴登盛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缅甸避免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消除贫困。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如果政策不当、治理不善，缅甸有可能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其一，缅甸资源的出口收益到目前为止未能真正转化成生产资本。2006 年以来，缅甸每年仅天然气出口收益就在 20 亿美元以上，但这些收入并没有进入政府帐目或政府预算，其管理和使用的具体情况外界不得而知。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收入实际上是由军方掌控，且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其二，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使资



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从而破坏自然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三，缅甸石油、天然气、宝石、木材等自然资源大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就动荡不安，时常发生武装冲突，而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强制劳动、非法征用土地、环境破坏等问题可能会引起新的矛盾和冲突。缅甸环境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说：“缅甸正处在建立和平的进程之中，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即达成初步停火协议，我们担心，如果政府在这一和平脆弱的阶段加快对这些冲突地区的投资，它会引发更多的战斗、冲突，使局势更加紧张。”不稳定的局势无疑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四、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尽管吴登盛政府的改革面临着许多难题与挑战，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反对意见，但缅甸改革总的进程不会逆转。

第一，摆脱贫穷是改革的最大推动力。民族冲突和贫穷一直是独立以来缅甸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贫穷问题直接影响缅甸政局的稳定，甚至危及政权的生存。吴奈温领导的社会主义纲领党下台的最直接原因是经济建设的失败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军人执政后，缅甸经济并没有大的改观，缅甸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民生问题仍是引起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2007 年 8 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突然宣布取消所有燃油补贴，致使柴油和汽油价格上涨了 66%，天然气价格上涨了 500%，食品和运输等商品的价格也随之暴涨，由此引发了所谓的“藏红花革命”。缅甸水电资源丰富，全国却有 75%的人用不上电。2012 年 5 月，因经常性停电，曼德勒爆发了近五年来缅甸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并波及其他城市。上述事件说明，如果不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民生问题，缅甸将永无宁日。因此，以改革谋发展是缅甸唯一的出路。

第二，改革是缅甸执政当局的基本共识。吴登盛政府的改革是前军政府内部达成基本一致的结果。即使吴登盛政府内部和军方内部有人反对改革，但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一个明确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外界不少人认为军方可能不太支持改革。为了打消这一疑虑，今年 6 月 4 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部长拉敏（Hla Min）不仅声明军方百分之百支持吴登盛总统的改革议程，还表示军方在议会拥有 1/4 席位的规定“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将作修改”。不仅如此，改革派在政府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和巩固。7 月，强硬人物副总统丁昂敏乌（Tin Aung Myint Oo）辞职，联邦议会选举温和的前海军司令年吞（Nyan Tun）接任。9 月 7 日，议会批准了吴登盛上任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内阁改组。这次改组，总统府部长增至 6 人，9 名部长调整了岗位，12 名新人出任部长，文职技术官员和改革派官员得到了重用。正如缅甸著名历史学家吴丹敏（Thant Myint-U）所言，这次内阁改组“无疑是对吴登盛总统改革议程的巩固”。



第三，改革已步入“协议转型”的轨道。吴登盛上台后开启了包容性政治进程，允许全国民主国盟为代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补选，进入议会；一些少数民族政党进入议会；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皆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愿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样，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军方支持的政府、以全国民主联盟为首的民主派、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少分歧，实际上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改革，实现国家转型。吴登盛称，缅甸“宪政民主转型已有条不紊地踏上了一条和平之路”。[39]按转型理论说，缅甸已踏上了“协议转型（pacted transition）”之路。对于各主要政治势力长期纷争不断的缅甸来说，“协议转型”无疑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缅甸政坛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已达成妥协，同意共同推进国家转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政府与少数民族政党和武装组织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协议转型”的各方相互妥协，减少分歧，避免冲突，是保证改革平稳、顺利推进的关键。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王陶陶

编辑：宗洁、王菡、胡馨以

设计：潘雯怡、张宇星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